

空间、时间与基督教的中国处境

——以《圣山下的十字架》为中心

黄剑波

数年之前,道风书社曾经推出过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年)。这种田野调查报告式的研究成果在那个以神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研究为主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丛刊”系列中显得颇为异类,而这也显示了以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等香港的相关研究机构的眼光和承担。

事实上,在本书推出之后,道风书社于最近又推出了高师宁的《当代北京的基督教与基督徒:宗教社会学个案研究》(2006年)。据说,道风书社还有继续推出实证性研究报告的计划,而《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也计划于2007年推出一期“实证性基督教研究”专题。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也积极推动这种关注现实状况的研究,在“专文报告”系列中出版了范丽珠的《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变迁:深圳特区研究报告》(2002年),并计划在“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丛书”系列中推出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年)。研究中心主任吴梓明教授还联合三位国内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在山东泰安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其成果就是这本《圣山下的十字架》。这些在香港展开的学术活动与国内整体的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是互为呼应的,国内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一批有志于实证性宗教研究的学者,也分别展开了一些富有意义的田野调查研究。

一、“圣山下的十字架”:空间概念与文化相遇

显然,书名是经过作者的精心考虑之后才选定的。“圣山”是指泰山,乃五岳之首,上古之时即被视为神山加以崇拜。汉魏之后,泰山崇拜演化成“主召人魂魄”的“司命之神”(本书39页)。民间对其的崇拜多为祈福饕灾,而历代王朝为求得四海安宁,社稷永保,对泰山更是多方崇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泰山的大规模封禅祭祀。据统计,从公元前61年汉宣帝“制五岳礼”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礼岳”,历代皇帝先后遣使123次祭祀泰山(本书41页)。“圣山下”是一个地域性概念,指的是泰安,由于其“庙多神全”,在历史上有“神州”、“神府”之称(本书42页)。作者特别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泰山以及泰安地区具有深厚的宗教性,隐约中暗示了基督教作为外来者势必要面对地方早已形成的宗教文化传统。

“十字架”当然是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书中的主体部分其实就是对泰安地区的一个天主教会(满庄)和两个新教教会(北新庄和青年路)的田野调查而形成的三个调查报告组成。作者指出,“本书涉及的三个不同的教会也可以作为三个独立个案研究,供日后学者作为参照或与其他基督宗教个案一并作比较研究”。(本书30页)

可见,“圣山下的十字架”所要表达的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更有一个文化相遇的假设。事实上,作者用了一个有趣的概念来比喻在华基督教——“新移民”。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其意在“说明与本土的传统信仰相比,基督宗教是后来者,而不是说其在华传播历史之短暂”。(本书53页)

且不论“新移民”这个概念是否適切,但“圣山下”与“十字架”其实已经在空间意义上形成了某种对峙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共存的关系。不论是对峙,还是共存,这个概念都带有似乎存在两个不同的文化整体的假设,“十字架”所代表的乃是基督教,而“圣山下”则是地方传统。在此,

我们不讨论天主教与新教的差异,以及新教教派之间的差异,而假定基督教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但“圣山下”所代表的地方传统似乎难以简单地加以界定,正如作者所介绍的,泰安地区存在各种不同的信仰传统,就算将比较晚近和流传于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排除在外,也有儒释道,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因此,基督教到了泰安之后,所相遇的到底是一个作为整体的地方传统,还是分别地遭遇儒、释、道,以及民间信仰?或者说,基督教需要对话的到底是道,是佛,是儒,抑或是民间信仰?毕竟,不同的对话者所涉及的议题以及策略和进路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

二、历史过程中的基督教

本书的四位作者都受过系统的历史学训练,考据的功夫很好,很是令人佩服,特别是陶飞亚所撰写的关于北新庄教会的部分(参阅《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也正因为这样,本书似乎更倾向于主要是一项历史研究,而不仅仅是对现状的讨论。

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学或人类学进行当代中国基督教个案研究时需要注意之处。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每一门考虑周全的社会科学,都需要具备观念的历史视野以及充分利用历史资料。”(见《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使用是非常肤浅,甚至庸俗的,通常不过是一个背景的铺垫,一些材料的堆砌,而没有从社会与历史意义的角度去考察历史,从历史中体察出社会逻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都需要接受一些基本的历史学训练,在历史的脉络中才可以更深刻和更准确地认识当代社会。

近些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历史学者有意识地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张先清的《官府、宗族与天主教:明清时期闽东福安的乡村教会发展》即是一例,并且得到了以历史学者为主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第一届博士论文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不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面临的潜在问题一样,历史学者在理解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时也存在一些可能的陷阱。例如,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本身就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而绝不仅仅是一个资料收集的方式。再如,社会学意义上的抽样和问卷对于过程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在分析过程中的赋值也有一系列的规范,而绝不仅仅是随便拟出几个问题,找几个人填填表格而已。

从方法论的问题转回来,本书在处理泰安地区的基督教话题时,显然是将其放置于历史过程中来考察的,甚至对当前问题的讨论,以及对将来走向的理解也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下进行的。这个时间概念的引入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教在2000年历史上的变迁。具体到泰安来说,可以更完整地把握广义的基督教自13世纪以来在山东地区的传播过程和方式(本书53页)。

以北新庄教会为例,陶飞亚通过对敬奠瀛个人生活史的细致交待,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历史场景(historical context)。作者多角度地剖析耶稣家庭与西方传教士、与地方社会、与政府等的互动,而这也使得当前的北新庄教会的一些教导、仪式、行为方式更容易被理解和认识。

三、中国处境下的基督教

尽管这是一个地域性研究,讨论的是泰安地区的个案,但是作者所关注的显然是更大范围上的中国处境下的基督教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问题。因此,“宗教与社会互动个案研究”才被选定作为副标题。

作者指出,以往有关宗教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多是着重在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文化或是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等。不论是早期的“宣教史”研究进路,从基督教“占领”(occupation)中国的角度进

行分析和讨论,还是近些年出现的所谓范式转换,即把关注的主体转移到中国社会如何回应这一外来文化冲击,基本上是对费正清(John Fairbanks)的“冲击与回应”理论的应用(本书30页)。作者提出,“本研究除了关注基督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化外,更特别注意基督教是如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传统宗教文化及政治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更具体的互动及改变”。(本书30页)换言之,他们所关注的主体又回到了基督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关注与过去的“宣教史”的研究进路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所强调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如何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冲击而促使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和现代化(本书30页)。

然而,究竟存不存在“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即本土化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呢?从一方面来讲,似乎没有必要言必称“中国特色”(或地方特色),基督教如果只是地方性的,只是“中国的”,那肯定已经与基督教的普世性(universality)相去甚远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普遍意义上的基督教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做出了程度不一的调适,当然可以不必使用“本土化”这样的术语,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已经具有了地方性(locality)。

确实,基督教是在具体空间地域中存在的,泰安有别于上海,中国有别于法兰西。但是,基督教同时还具有超空间性这个维度。也就是说,地方性(local)与普世性(universal)这两个方面对基督教来说是并存不悖的。“十字架”固然是普世性的,但既然在“圣山下”这个具体空间场域中,就已经具有了地方性的特质。

同理,基督教也是在具体时间内存在的,而且在历史过程中有着许多的变迁,11世纪的景教不同于13世纪的天主教,更是与20世纪的新教有别。但是,基督教同时也具有超时间性这个维度。换言之,历史性(historical)与普同性或大公性(catholic)这两个方面对基督教来说也是共生共存的。21世纪的基督教固然是历史性的,但却具有超时间的大公性。

事实上,从更大范围来看,正是在这个普遍与特殊的创造性张力(creative tension)中才显出了基督教的活力,永远都有新的增长点。照中国人的说法,也许更适合称之为辩证式的和谐(harmony)。这其实也与基督教具有一个超越的维度有关,因为这样就一直有一个开放的空间,在具体的时空中能以保持自己的超然性。

推及开去,汉语神学的讨论其实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境况,即既不能忽视中国人的生存体验,也不能只面对中国人或中国的处境构建一个所谓的“中式神学”。我所理解的汉语神学,一定得是以世界或天下为己任,甚至面向不同的时代。神学一定得是普世意义的,至少其立论和对象得是世界性的。当然,其生长点可以是中国具体的生活处境和体验。经过这样反思基础上的汉语神学才可能成为普世神学的一个独特贡献,既是“普世的”,也是“独特的”,而不至于落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救国论的桎梏之中,甚至一些似是而非的貌似神学的文人的纯粹的形而上学构建。

四、理论的理解、应用与态度

在这个宗教与社会互动研究中,作者借用了当前影响甚大的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论(rational choice)作为统摄全书的理论框架。理性选择论在经济学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甚至将之用于讨论宗教问题也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有所涉及。而在当代宗教社会学领域内,斯塔克(Rodney Stark)无疑是充分阐释和推动此一理论用于宗教研究的最为重要的西方学者。

前段时间读到张清津题为“天堂和尘世的均衡:宗教作用的经济分析”的论文,尽管他的主要参照体系是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伊安纳康(Larry Iannacone)的宗教经济学理论,但这一理论本身也是受斯塔克的理论启发和影响而成。记得在“科学研究宗教学会”2004年会的一个主题发言中,伊安纳康教授笑称有三个理由支持他所主张的宗教经济学理论,分别是上帝同意(God approves)、斯塔克同意(Rod approves)、市场同意(Market approves)。尽管这只是一个

玩笑,但斯塔克的影响从中仍然可见一斑。

对于汉语学界来说,斯塔克和芬克合著的《信仰与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文译本(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的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事件。这本书一出版,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出现了来自不同领域学者的书评。例如,张志鹏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了题为“宗教信仰市场经济学分析”的长篇书评。他认为,该书“不仅宣告了宗教社会学研究新范式的彻底胜利,而且也标志着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理性选择假说又成功地占领了一个新的领域。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强烈地显示了社会科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的通路,二者完全可以实现和谐的联结和统一”。另外,黎念青和温春娟的“宗教研究范式转换的中国透视:读《信仰的法则》”(转引自 http://www.gmw.cn/02blqs/2004-09/07/content_177259.htm)则试图运用宗教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解读中国的新兴宗教现象。而在宗教研究领域比较引人注意的是魏德东的“宗教市场论:初读《信仰的法则》”(转引自 <http://philosophyol.com/dept/teacher/religion/wdd/200504/592.html>),其后他更以“宗教研究范式的哥白尼革命:读《信仰的法则》”为题对其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推介(转引自 <http://edu.sina.com.cn/1/2004-04-29/66742.html>)。

事实上,早在中文译本推出之前,经济学家汪丁丁就注意到了这本书,并以“信仰的经济学”为题向国内读者作了简要介绍(见《经济学家茶座》第4辑),还向国内出版社推荐进行翻译。汪丁丁对该书的一个基本定性是“在经济学家很少涉足的信仰领域里建立了人类宗教行为的经济分析框架”,并初拟了一个中文书名《信仰的行动:对宗教的世俗解释》。他认为,“斯塔克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论证了效用主义的行为如何可以从‘现世’报酬的计算过渡到‘来世’报酬的计算。正是这样的论证提供了宗教行为的世俗解释”。用经济学语言表达出来就是,“对已经获得信仰的人来说,现世的任何报酬都无法补偿失去信仰的痛苦,故而他们情愿放弃巨大的物质利益来保持信仰;对没有获得信仰的人来说,来世的任何报酬都难以换取现世的快乐,故而他们必须获得足够的物质利益补偿才愿意参与宗教行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汪丁丁在高度评价这本书的同时,也注意到这个理论框架的有限性。他指出,“信仰所产生的效用,如果表达为‘消费-生产’模型的话,用于生产‘信仰服务’的生产函数的各种宗教行为的投入其实没有发生突变,而进入效用函数的‘信仰服务’的边际效用发生了突变。换句话说,在获得信仰的那个时刻,偏好序本身(价值判断准则)发生了突变。因此经济学必须寻找一种能够容纳偏好序内生变动的分析框架,否则便无法解释信仰行为”。接着,他断言“‘信仰问题’揭示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学阐释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经济学无可言说”。

汪丁丁还特别否定了构建一种经济学分析框架来容纳内生变动的偏好的可能性。他提到,“经济学家把心理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以及一切个体理性之外的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统统都概括在‘偏好’这个概念下了,正如经济学家把技术因素、市场因素、地理因素以及影响个体选择的一切环境因素统统都概括在‘成本’概念之下一样。给定偏好序和成本结构,经济学可以理性化一切人类行为。但是如果允许偏好发生变动,经济学家就不再有资格解释,因为他们必须向别人请教,例如向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请教,才能够解释偏好是怎样发生变动的。换言之,在允许偏好内生变动的框架里,经济学家将不再是经济学家”。

在此我之所以大量引用汪丁丁的论述,旨在说明我们也许需要学习这位经济学家那种冷静地对待任何一个理论态度的态度,其评判是基于合乎学理的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生搬硬套。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评论,例如李顺华的“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经济之间:评《信仰的法则》”(见《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四十期,2006年)一文,他在充分肯定理性选择论在理解宗教现象的解释力上,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提出了一些反思和批评。而黄剑波和孙晓舒针对斯塔克另一项运用其理论进行的具体研究《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撰写的“历史的另一种写法:从《基督教的兴起》看社会学家笔下的早期基督教史”(见《基

《基督教思想评论》第 5 辑, 2006 年)一文也对此略有讨论。

也正是因此, 我比较欣赏作者如下的说法, “我们不单讨论这些定义和命题对泰安地区宗教研究的適切性, 我们还会以我们在泰安地区的观察及研究结果去审视斯达克和芬克理论的真确性或可用性”。(本书 25 页)作者也意识到, “有学者对广义的‘理性选择理论’(并不局限于宗教社会学领域中)的理性限度做出反思, 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显然过分强调了人的理性, 而忽视理性本身的局限性”。(本书 270 页)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作者在反思基础上提出一个问题, “理性选择理论是否只强调人表面的理性选择一面, 而忽略了人的内在感性经历也是一种属于理性选择的一部分呢?”(本书 272 页)接着, 作者提出, “感性的选择从深层的意义上说, 也委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它的目的也是趋利避害、趋吉避凶, 并且也是为了寻求得到最大的效益和回报”。(本书 272 页)作者认为, “感性的选择既然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 也是信仰者所选定长时期的生活方式, 它理所当然地是属于理性选择的范畴之内, 只不过它并不是那么明显易见, 因而较容易被人忽视罢了”。(本书 273 页)作者相信, 这“或许可以将之视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对近代宗教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个补充诠释”。(本书 274 页)

这里且不讨论这个结论本身成立与否, 仅这种开放的怀疑态度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 也只有在这样的积极反思的条件上, 理论才有被应用的价值, 也才会有继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可能。而且, 反思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原有理论的充分理解和把握。在本书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选择理论一直贯穿在整个研究之中, 作者还在“导论”和“结论”部分浓墨重彩地分别介绍理性选择论的基本逻辑, 以及其在泰安个案研究中的適切程度和需要补充之处。其中, 对于社会资本和宗教资本的讨论尤为详细。

理性选择论的基本命题本身并不复杂, “纵然受着个人的知识及理性能力的限制, 纵然在有限的选择范围之内进行选择时甚或受到个人的倾向和喜好所影响, 但人总是会努力地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的”。不过, 斯塔克等人的创见在于认为, 宗教的选择也是这样的(本书 22 页)。而且, 在宗教信仰的选择中, 必须涉及个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即个体人际关系的统整(本书 22 页)。简言之, 人们会尽量保持自己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愈大, 人们便愈不可能转变宗派(re-affiliation)或皈依新的宗教(conversion)。在转变宗派的时候, 人们会选择那个能最大化他们社会资本的选择。同样, 在皈依新的宗教的时候, 人们也会选择那个最能保留他们社会资本的选择(本书 24 页)。

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宗教或基督教的研究呢? 作者认为, “总的来说, 在泰安地区基督宗教研究的个案中, ‘理性选择理论’所描述的宗教现象是十分適切中国的处境的”。(本书 26 页)四位作者的研究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在批判和反思中运用理性选择论来寻求对中国宗教和社会更深刻的理解。因此, 我很认同作者的这个说法, 认为“尽管‘理性选择理论’在学理上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 但它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本书 29 页)确实, 中国的宗教研究需要引入更多有穿透力的理论, 特别是向已经形成比较深厚的学科传统的西方学界学习, 只要我们既不妄自菲薄, 随大流, 也不自以为是, 闭门造车, 而是扎扎实实地学习和掌握理论, 实实在在地进行田野调查。正如作者在书末的期许那样, “盼望藉此能够抛砖引玉, 能引发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激励更多的学者进行更广泛的田野实地研究, 并能对宗教社会学的理论作进一步及深入的探索”。(本书 295 页)借此为结。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 100872)

(责任编辑: 常 英)

空间、时间与基督教的中国处境——以《圣山下的十字架》



为中心

作者: [黄剑波](#)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100872](#)
刊名: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7, 24(4)
被引用次数: 0次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nydxxb-shkxb200704016.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59b7854c-33d6-456d-8c56-9e4d00779df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